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的中国外销民俗画收藏*

柳若梅 [俄]波波娃

中俄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悠久,蒙古帝国时期欧亚贯通,中国商品大量传往欧洲,使得中国商品对俄国人来说不再陌生。16世纪中国的器物文化便已为俄国宫廷所知晓,17世纪即有俄商来华贸易,中国物品成为俄国宫廷贵族猎奇的目标。18世纪欧洲特别是法国的中国热随着俄国沙皇彼得一世的引欧入俄被引入俄国,欧洲大航海时期由海路泊来的中国物品和中国知识也被间接地引入俄国,形成了中国文化在俄传播的一个特殊阶段。灿烂的中国文明和富足的物质文化刺激着与中国直接接壤的俄国的强烈兴趣,同中国建立稳定的政治关系以确保长久的经济联系成为俄国对华外交的主要目的,并为此费尽心思地以为中国东正教俄俘居民主持宗教生活为借口,派出了长期驻扎北京的俄国东正教使团,由此拉开了中俄之间文化交流的大幕。俄罗斯东方文献研究所档案藏品中的中国外销民俗画,少量为18世纪由欧洲引入俄国,主要由俄国东正教北京使团成员19世纪在中国订购,是18-19世纪中俄文化交流的具体体现。

一、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的中国外销画收藏情况

俄罗斯东方文献研究所是俄罗斯最具有东方学(汉学)传统的研究机构,与俄罗斯的东方学(汉学)发展史密不可分。其前身最早为彼得堡科学院珍宝馆。随着馆藏的增多,1818年,成为收藏与研究兼具的亚洲博物馆。1930年,更名为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1956年,东方学研究所迁至莫斯科,将图书馆中的东方手稿收藏及研究部分留在了列宁格勒(即原彼得堡),更名为“苏联科学院东方所列宁格勒分部”。2006年,成为俄罗斯科学院体制中独立的研究机构——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东方文献研究所的档案馆保存着大量东方学手稿(中国学者关注的敦煌经卷、西夏手稿都藏于此)。其中国外销画收藏十分丰富,有中国植物、动物、花鸟、鱼类、船只以及大量的市井风情画。主要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攻关项目“20世纪中国古代经典文化在海外的传播”(项目编号07JZD0038)阶段性成果。

包括以下五笔：

1.最早的外销画来自馆中的斯特罗干诺夫特藏，共 233 幅，分为 4 种。其一为“鱼”册，包括 60 幅水彩画，中国厚纸，题名为带拉丁字母注音的汉字，画作尺寸为 27×34.5 厘米；其二为“花”册，包括 37 幅彩色画，为同一画家所作，画作尺寸为 29.5×36 厘米，订成红色山羊革画册，封面上有汉字“花”；其三为船舶画——“中华帝国的船”册，包括 69 幅大船画，带汉语落款和西班牙文简要解说，以红色天鹅绒包面，画心为 25.5×32 厘米，画幅为 29×36.5 厘米；其四为 67 幅硬纸画装在一一只欧式风格的硬纸盒中，画心 20.5×25.2 厘米，画幅为 22.5×27.5 厘米。画面上的人物包括帝王、将军、建筑、身着官服的官员、身着民族服装的人物、道教和佛教寺庙中的仪式场面、中国城市市井生活等。画面上无说明，但有汉字（如在画面上出现的庙宇名称等）。

2.两本中国通草画册，共 26 幅。第一册为皮质封面，有 12 幅中国船图和 8 幅中国服饰，画作尺寸为 20×28 厘米，水粉颜料，画面共占 16 面的篇幅（暂算 16 幅）。这些图画的图案风格、色彩、丝绸装饰尺寸与“西方人眼里的中国情调中的新呱的画相似，很可能出于同一个画坊”^①。亚洲博物馆于 1909 年获得该画册。第二本画册为丝绸包面，10 幅画都画着中国船。画心 20.5×30 厘米，画幅为 23.5×33.5 厘米，宽 1 厘米的深蓝色绸带边框，装裱完好。1920 年起亚洲博物馆的资产目录中始出现该画册。

3.波波夫(А.Ф.Попов)画册，共 5 册，515 幅（第一册共 108 幅，第二册 109 幅，第三册 111 幅，第四册 77 幅，第五册 110 幅）。面册封面为墨绿色仿皮革材料，册脊和四角包有褐色皮革，画心均为 22×35 厘米，画幅 31.5×47.5 厘米，所有画面都有汉语说明。说明每行 10 个汉字，每幅画的说明一到十行不等，说明语言直白，字体粗糙，以楷书书写。有的简单说明有俄文翻译，译文写在画的背面或单独另作一页。所画内容为手艺人、商人和农民。2009 年，在俄罗斯科学院汉学家协会主席米亚斯尼科夫院士(В.С.Мясников)主持的“中国史的非传统史料：清史 [Нетрадиционные источни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Китая Династии Цин (1644–1911)]”系列丛书中，东方文献研究所在圣彼得堡出版了《民俗画上的清代北京》^②一书，展出了波波夫画册中的第一册和第五册。

4.在东方文献研究所档案馆有布列特施涅德宗特藏的民俗画共 12 册 562 幅。棕色大理石花纹纸封面，深棕色册脊，画心为 22.5×35 厘米，画幅为 26×36.5 厘米，以水颜料在薄白纸上所画，每页中有画前对折的折痕。布列特施涅德(Э.

① Н.В.Степанова, Л.И.Крякина, Ю.Г.Арчакова, И.Н.Кулешова, Опыт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 реставрации экспортных китайских картин на тетрапанаксе бумажном из коллекции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фонда Санкт -Т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филиала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РАН, Письменные памятники Востока. №2 (7), СПб., 2007, 291.

② Российская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Институт Восточных Рукописей, Цинский Пекин картины народной жизни (Миньсухуа), СПб.: Славия, 2009.

В.Бреднешенейдер)为这些图画分了类,并在每册的封面上用德语作了说明:画册编号、图画编号、存放地,画面内容:

I, 1—44:王公、官员、将士、僧侣、外国人;

II, 45—89:穷人、罪犯;

III, 90—133:治病、教育、考试、出生、教育孩子;

IV, 134—194:丧葬、新年风俗、迷信、祭祀,每月仪式;

V, 195—261:游戏、马戏、戏曲;

VI, 262—307:娱乐、商贩、交通工具、理发匠、仆人、乐师;

VII, 308—352:打更人、救火员、送水人、洗衣人、卖肥皂布头针头线脑毛皮花边的、裁缝、卖衣服的;

VIII, 353—405:家具工、木匠、做木桶的、做帽子的、卖火盆炉子鞋子玻璃制品瓷器餐具的、钎焊工、镀金匠、采金匠;

IX, 406—463:收废纸的、收废品的、采煤的、用麦秸和牛角做扇子的、油彩匠、收炉灰的、扎扫帚的、打毛衣的、洗衣服的、烧砖的、石匠、雕刻匠、童戏;

X, 464—509:卖香草花卉的、搬运工、送货送报跑腿的、抽烟抽大烟的、灯、兑换钱的、做铭牌告示银锭的、灭虫的;

XI, 510—562:卖家禽、野味、肉类、牛奶、螃蟹、水果、面粉、烤货的;

XII, 卖红薯、豆子、冰块、酒、茶、糖的,农活儿等杂类。

5.1958年,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的前苏联科学院亚洲各民族研究所在旧书店中买到一本画册,含画301幅,均为周培春画的仿品。其中很多与波波夫画册的内容相同,只是在用笔和颜色上有细微差别。

二、中国外销画收藏的重要人物

这五笔中国外销画收藏折射了俄国认识中国的不同时期。

1. 斯特罗干诺夫

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在彼得一世(实行统治)的“引欧入俄”中被带到俄国,叶卡捷琳娜二世(1762—1796年在位)与欧洲启蒙思想家的密切交往,也进一步使18世纪的俄国社会将“中国情调”视为时尚。女皇叶卡捷琳娜一世(1725—1727年在位)在俄国最先拥有了“中国房子”,尽管面积不大,但俄国工匠以中国手法绘制的漆画墙板,漆画墙板之间雕花镏金的多宝格上的造型多样、线条奇巧精致的瓷器摆件,衬托得画墙更加精巧,使房间具有了浓厚的中国情调^①。叶卡捷琳娜二世专门邀请意大利工匠来俄国修建的中国宫则更是不同凡响——“满眼风景画,一直画到顶棚的装饰图案、画面,再加上建筑设计上的细节安排,所有这一切都浑然一体,获得了有如海顿或莫扎特的奏鸣曲般纯

^① О.Л.Фишман, Китай в Европе: миф и реальность (XIII—XVIII в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2003. Стр. 403.

净的音乐效果”。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御用建筑师在皇村修建的中国剧院,被称为18世纪后四分之一时期中国情调的典范之作。18世纪的俄国,来自欧洲的有关中国的消息在俄国知识界传播广泛,在北京的耶稣会士发给欧洲的中国消息、在欧洲出版的关于中国的书籍,很多都被译成俄语在俄国出版。而俄国同中国直接交往得到的中国信息,却因俄国垄断陆路与中国联系的通道而被视为国家机密而束之高阁,只供政府少数人了解。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斯特罗干诺夫收藏中的中国外销画,就来源于这一时期。

斯特罗干诺夫家族是俄国历史上的一个声名显赫家族,他们是“最天才、最有头脑的人,很可能也是当时地球上最富有的人……在俄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于俄罗斯人来说,斯特罗干诺夫不仅仅是一个姓氏,而是一个完整的世界”^①。斯特罗干诺夫家族的中国物品收藏起于17世纪,有明确记录获得了中国物品的是18世纪斯特罗干诺夫家族中的一位伯爵——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斯特罗干诺夫(А.С.Строганов, 1733-1811),收藏有俄国最早的中国外销画的,也是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斯特罗干诺夫。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毕业于日内瓦大学,与伏尔泰相识,为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的彼得堡公共图书馆馆长,叶卡捷琳娜的宪法委员会成员。在彼得堡艺术学院成立时就担任其荣誉成员,1800年担任院长。亚历山大一世时期(即1801-1825年间)的国会成员。亚历山大·斯特罗干诺夫有很高的文学艺术天分,也是斯特罗干诺夫家族中对文学艺术支持力度最大的人之一。俄罗斯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捷尔查文^②、波尔特年斯基^③、克雷洛夫等都得到过亚历山大·斯特罗干诺夫的资助。18世纪末,从推动俄国社会文化艺术发展的立场出发,亚历山大·斯特罗干诺夫将其收藏向社会公众开放,此举令俄国文化界“大开眼界”,其图书馆被认为是俄国最好的图书馆,其艺术收藏发挥了巨大的教学示范意义,彼得堡艺术学院以之展开教学。列维茨基^④、伊万诺夫^⑤、舍布耶夫^⑥、

①Страгановы. Меценаты и коллекционеры.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лавия. 2003.

②捷尔查文(Гаврил Романович Державин, 1743-1816),启蒙时期俄国重要诗人,俄国古典主义文学代表人物,其后期创作突破古典主义模式,出现现实主义倾向,对普希金等很多19世纪诗人的创作有着重要影响。

③波尔特年斯基(Бортнянский Дмитрий Степанович, 1751-1825),俄国作曲家、指挥家,俄罗斯古典音乐传统的创始人之一。

④列维茨基(Левицкий Дмитрий Григорьевич, 1735-1822),俄罗斯风景画家、标准肖像和室内人像大师,彼得堡科学院院士。

⑤伊万诺夫(Иван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Андреевич, 1806-1858),俄罗斯画家,圣经题材画和古代神话题材画的创始人,俄国学院画派代表人物,巨幅油画《耶稣向世人显圣》的作者。

⑥舍布耶夫(Шебуев Вас. Козьмич, 1777-1855),俄罗斯风景画家,古典主义画派代表人物。

休金^①、马尔托斯^②都经常拜访亚历山大·斯特罗干诺夫。亚历山大·斯特罗干诺夫同时还是一名慈善家,是很多作家、画家的庇护人。正是在他的资助下,格涅季奇^③于1807年得以完成了他一生最重要的事件——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的俄文全译。

亚历山大·斯特罗干诺夫收藏的中国外销画,原为马德里圣费尔南多美术学院教授的收藏品,为西班牙皇家贸易公司大班马努埃尔·帕洛米诺所作。被亚历山大·斯特罗干诺夫在1794—1796年间获得。后来一直保存在国立埃尔米塔什博物馆的斯特罗干诺夫宫,1929年起藏于亚洲博物馆。

斯特罗干诺夫家族的慈善事业一直持续到当代,生活在法国的斯特罗干诺夫家族的后代艾兰·德·路汀海泽(艾兰·斯特罗干诺娃)发起成立了斯特罗干诺夫基金。鉴于艾兰对慈善事业的贡献,在俄罗斯国家博物馆的推荐下,1999年,俄罗斯总统为艾兰颁发了荣誉证书。2003年10月14日至2004年1月25日,斯特罗干诺夫基金支持下,在圣彼得堡冬宫举办了斯特罗干诺夫家族收藏展,展品中就包括本文提到的这三本画册。

2.波波夫

第三笔中的500多幅外销画,反映了19世纪中叶的中国北方市井生活,是1856—1870年间生活在中国的俄国东正教使团随团学生波波夫在中国订购的。

阿法纳西·费拉蓬托维奇·波波夫(Афанасий Ферапонтович Попов, 1828—1870)彼得堡神学院毕业后就开始在俄国的宗教管理机构工作。1855年获得诵经硕士学位,1856年调往外交部作为随团学生编入第十四届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使团^④。在北京的波波夫关注中国的政治生活和当时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在彼得堡发表文章介绍中国的盐税和关税,还为俄国外交部翻译过《京报》上关于中国财政状况的内容。他的《北京东正教使团一名成员的日记》、《南京之战46天》反映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的中国北京、南京的日常情况。俄国特使伊格纳季耶夫(Н.П.Игнатьев)1859—1860年在北京期间,波波夫为他担任翻译,后来担任了天津领事处的秘书和俄国驻北京使团的翻译。此后波波夫又应

①休金(Шукин Степан Семенович, 1754—1828),18世纪俄罗斯人像画家,因创作保罗一世的肖像画而被授予科学院院士。

②马尔托斯(Мартос Иван Петрович, 1754—1835),18世纪俄罗斯雕塑家,纪念碑雕塑设计家。叶卡捷琳娜二世、亚历山大一世的雕像、现莫斯科红场上的雕塑等都是马尔托斯的作品。

③格涅季奇(Гнедич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1784—1833),俄国诗人、翻译、散文家,戏剧活动家。

④А. Ф. Попов, Путевые заметки о Ханькоу и русских чайных плантациях, — "Записки по отделению статистики ИИРГО", 1871, т. II, стр. 537—571 (文章结尾有波波夫的简短生平)。

中国政府的请求在同文馆教俄语,于1870年在北京去世。

波波夫在京时值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欧洲各国在华争夺利益,俄国对华政策活跃,对中国了解的渴望加强。1863-1864年期间波波夫担任了《彼得堡通报》的通讯员,从北京向俄国发回了大量介绍中国时事状况的简讯。从这些简讯的内容来看,显然在北京生活14年的波波夫对中国各民族及其风俗、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器物文化很感兴趣,如1863年3月19日(俄历)《彼得堡通讯》上发表的他的《中国新年》中介绍了他所亲历的中国春节时游戏娱乐的传统风俗。另外,他在俄国发表的《中国谚语和俚语》等也同样记述了中国人的日常风俗。俄罗斯东方文献研究所收藏的波波夫画册,应是目前所知的北京艺人最早创作的北京民俗画。

3. 布列特施涅德

布列特施涅德(Эми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Бретшнейдер, 1833-1901)(即“贝勒”——译者注)生于俄国库尔良省,获得医学学位后又在柏林、维也纳和巴黎接受教育,1860年进入俄国外交部工作,1866年被派往俄国驻北京公使馆担任医生。在中国期间,布氏在中国的历史地理、中国植物研究方面成就突出,1876年在上海发表的《北京及其周边地区的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е 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о Пекине и его окрестностях)^①被译成法文出版,并获得了法兰西学院奖金。收集中国植物并向彼得堡植物园寄送种子、果实和树木样本,一直是俄国驻华机构医生的重要职责之一。布氏寄往彼得堡植物园的种子和标本十分丰富,还将一些种子、植物的标本寄给了美国的植物研究机构和学者个人^②。在北京期间,布氏聘请了北京画家,为他绘制了当时北京各阶层的生活,这便是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收藏的这562幅画。1995年,东方文献研究所学者索罗宁从这批画中选出126幅,在英国出版^③。

三、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藏中国民俗画价值

1. 具有重要的民俗学价值。

波波夫和布列特施涅德带回的中国外销画大多为表现北京日常生活风情的民俗画。民俗是特定群体内模式化的生活文化,具有传承性、广泛性和稳定

① E. Bretschneider, *Arch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Researches on Peking and Its Environs*, London, 1876, p.63; idem, *Recherches archeologiques et historiques sur Péking et ses environs*. Ouvrage couronné par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Traduction française par V. Collin de Plancy, Paris, 1879, p.133.

② П.Е.Скачков,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М., 1977. Стр. 180. 中译本见柳若梅译:《俄罗斯汉学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57页。

③ K. Y. Solonin, *The Bretschneider Albums: 19th Century Paintings of Life in China*. Reading: Garnet Publishing Ltd., 1995.

性。在缺乏照相技术的时代,将活生生的北京生活提炼为模式化的民俗画,具像地向俄国展现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帮助俄国社会准确地从整体上了解中国特别是俄国东正教使团常年驻扎的北京的有效手段。

圣彼得堡 2009 年公布的波波夫带回的外销画的第一册和第五册(以下序号为原画册中的序号)。

第一册的 108 幅外销画全部为北京的工商业民俗,体现了北京城市生活中精细的手工业分工、丰富的日常生活和商贸生活。

手工业民俗:

波波夫画册第一册中涉及手工业民俗者居多,如食物制作、服装服饰制作、生活用品修理及五金制作、文房物件制作、建筑分工、工匠行业,展现了农业社会中的北京城市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活。

食物制作(5种):

11/做豆腐; 21/ 轧切面; 65/ 蹲香油; 38/炒栗子;
37/ 漏水粉;

服装服饰制作(8种):

52/ 弹棉花; 22/ 染线; 5/ 成衣铺; 20/ 洗毡帽;
4/缝鞋脸; 16/ 排靴; 34/ 锉木底; 3/ 绣补服;

生活用品修理及五金制作(39种):

26/ 锯锅; 58/ 锯碗; 57/ 锯破缸; 69/ 拴笼屉;
66/ 编筐; 67/ 编草帽; 68/ 打苇箔; 70/ 卖笤帚;
51/ 磨剪刀; 45/ 钉马掌; 53/ 钉马掌; 39/ 沾羊烛;
61/ 撮烧烛铤; 9/ 修秤; 23/ 做羊角灯; 19/ 做不灰木炉子;
56/ 收拾天平; 83/ 收拾雨伞; 49/ 做潮烟; 6/ 捻丝线;
55/ 焊水烟袋; 1/ 镀金作; 7/ 拨丝作; 14/ 包金作;
63/ 锤金作; 81/ 钱局内锉钱边; 62/ 撮钱串; 64/ 铸钱粮仔;
25/ 沙里澄金; 8/ 收拾锡器; 74/ 施锡器; 18/ 铸钱到之火;
2/ 造景泰蓝; 41/ 铺水银; 75/ 钻顶; 50/ 踩锉;
12/ 造火枪; 13/ 钉车瓦; 71/ 铸犁; 24/ 拨土贼;

文房物件制作(16种):

10/ 刻笔管; 40/ 裱画; 48/ 刻字; 43/ 刷书;
44/ 拓法帖; 54/ 抄纸; 79/ 打冷金笺; 47/ 染纸;
59/ 糊灯笼; 77/ 做扇面; 80/ 糊团扇; 73/ 作琉璃玩物;
76/ 点翠; 60/ 琢磨玉器; 78/ 刻石碑; 15/ 塑佛像;

建筑分工(8种):

27/ 瓦作; 28/ 卖荆棘; 29/ 堆山石; 30/ 托砖坯;
31/ 打土墙; 32/ 打夯; 36/ 坎磨砖; 33/ 饮马槽;

工匠行业和粗活(7种):

17/ 石匠; 35/ 木匠; 42/ 铁匠; 72/ 铁匠;
82/ 夹银匠; 46/ 兽医; 84/ 掏沟; 85/ 挖煤;

商贸民俗(24种):

第一册中少量的商贸民俗展现了北京内容丰富多彩的集市贸易。波波夫所选取的明显是具有北京城市特点的部分,除少量实用内容外,以文房本帖和幼儿玩物居多,体现了北京市民安逸平和的城市生活。

91/ 点痣; 46/ 兽医; 101/ 卖耗子药; 92/ 卖鼻烟;
99/ 卖洋胭脂; 93/ 卖题名录; 94/ 卖法帖; 95/ 卖工尺字本;
89/ 卖职名帖; 104/ 卖钱摊; 108/ 卖佑衣; 86/ 卖香面;
106/ 端午节卖符; 87/ 卖冰灯; 88/ 卖金鱼; 90/ 卖仙鹤灯;
96/ 卖风哨; 97/ 卖走马灯; 98/ 卖车灯; 100/ 卖叭狗;
102/ 卖槟榔糕; 103/ 卖江米人; 105/ 卖洞子花; 107/ 卖琉璃喇叭;

波波夫画册的第五册(110幅)相比于第一册内容更加丰富,从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层面,通过农业生产民俗、工商业民俗、岁时节日民俗、日常生活民俗、社会组织民俗、人生礼俗民俗以及游艺民俗等画面,全面地展现了北京人的日常生活。

1.农业生产民俗(19种):

1/ 耕地; 2/ 耙地; 3/ 沟地; 4/ 锄地;
5/ 割高粱; 6/ 把麦; 7/ 乡间轧场; 8/ 扬场;
9/ 扇车; 10/ 浇菜园; 11/ 川玉米; 12/ 乡间磨麦;
13/ 乡间住户推碾; 14/ 铡草; 15/ 罗麦; 16/ 米铺蹬碓;
17/ 粮食至斛; 46/ 猎户; 105/ 京都住户养蚕;

2.工商业民俗(4种):

107/ 种牛痘; 108/ 推拿法医士; 109/ 卖药; 110/ 串铃卖药;

3.岁时节日民俗(2种):

21/ 贴挂钱; 22/ 拜年;

4.生活民俗(20种):

18/ 钓田鸡; 19/ 箍桶; 20/ 房屋; 23/ 包饺子;
24/ 扫街; 25/ 拿臭虫; 26/ 薰蚊子; 27/ 缝皮妇女;
28/ 栽刷子; 29/ 洗衣妇女; 30/ 缝穷; 31/ 纺棉;
32/ 捶衣; 33/ 双生子; 34/ 乳母; 35/ 摇车;
36/ 介绍老妈帮工; 37/ 抓周; 38/ 幼童上学; 72/ 婆婆车;

5.社会组织民俗(24种):

39/ 蒙馆; 40/ 士子乡试; 41/ 状元游街; 42/ 演步箭;
43/ 武场耍刀; 44/ 武场考试搬石; 45/ 武场拉硬弓; 48/ 抬枪;
50/ 报马; 51/ 大轿; 52/ 长随; 53/ 轿车;
54/ 请分子; 66/ 广东妇人; 82/ 添老儿; 93/ 汉官太太;

94/ 满洲妇人; 96/ 旗人行礼; 97/ 八旗妇女; 98/ 宗室;
99/ 红带子; 100/ 蒙古人; 101/ 外蒙古妇女; 102/ 太监;

6.人生礼俗民俗(12种):

55/ 念喜歌; 56/ 送寿帐; 57/ 过礼; 58/ 吹鼓手;
59/ 亮轿; 60/ 新妇下轿; 61/ 倒宝瓶; 62/ 娶新媳妇;
63/ 开脸; 64/ 崔生; 65/ 收生婆; 95/ 新妇倒茶;

7.游艺娱乐民俗(29种):

47/ 冰鞋; 49/ 摔跤; 69/ 下围棋; 76/ 踢球;
77/ 放风筝; 78/ 踢毽; 79/ 撞钟; 106/ 猜拳;
88/ 打太平鼓; 90/ 猜灯谜; 92/ 耍龙灯; 67/ 推雪狮子;
68/ 下连棋; 70/ 点蒿子灯; 71/ 放烟火; 73/ 玩雨水泡;
74/ 度柳翠; 75/ 放旗花; 80/ 抽陀螺; 81/ 祝马;
84/ 小儿打瓦; 85/ 排形头; 86/ 瞎子摸鱼; 87/ 打花巴掌;
89/ 打春牛; 91/ 踢绣球灯; 83/ 丢巧针; 103/ 妇女斗纸牌;
104/ 过五关。

这些描绘北京市井生活的民俗画的内容,在19世纪的北京外销画中已逐渐模式化,成为了解19世纪北京日常生活的重要材料。

2.折射着18-19世纪俄国对中国的兴趣。

在早期收藏中国外销画时期,俄国还处于认识中国的初期,同欧洲一样,俄国社会对中国的猎奇性关注集中于中国器物和自然博物,并未超出早期欧洲传教士带回的中国消息的范围。19世纪以后,特别是自1828年第九届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使团团长江林在俄国大量发表他关于中国的论著开始,俄国主流社会思想开始关注中国。而到了“19世纪中期,俄国的主要杂志就在积极研究中国问题,许多著名思想家也将目光投向这个国家。于是中国逐渐成了遥远而奇怪的国家,而且是完全异类的社会象征,各种思想流派的拥护者们在讨论俄国的未来时,就在激烈的辩论中开始使用这个象征符号”^①。与此同时,在波波夫和布列特施涅德在华的时代,中国与世界、中国与俄国的关系已发生剧变。自波波夫入华的1856年正是第二次鸦片战争被酝酿和挑起之时,至布氏离京的1884年,俄国胁迫中国签订条约达16份^②,通过这些条约,俄国在领土和通商问题上都取得了大量实际利益。这一切都刺激着俄国在中国的活动日

①[俄]亚·弗·卢金著,刘卓星等译:《俄国熊看中国龙》,重庆出版社,2007年,第36页。

②1858年中俄璦琿和约、中俄天津条约,1860年中俄续增条约(中俄北京条约),1861年中俄勘分东界约记,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1869年中俄科布多界约,1870年中俄乌里雅苏台界约、塔尔巴哈台界约,1881年中俄改订条约,1882年中俄伊犁界约,1882年中俄喀什噶尔界约,1883年,中俄科塔界约、中俄科布多新界牌博记、中俄塔尔巴哈台北段牌博记、中俄塔尔巴哈台西南界约,1884年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

益活跃,引发俄国社会对中国的兴趣不断增加,俄国来华贸易和探险的人数激增,这些民俗画可以帮助对中国感兴趣的俄国人直观地了解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和中国人的真实面貌、真实生活。

3.是研究晚清北京城市和社会文化的重要的历史资料。

俄藏大量表现中国民俗的外销画,其订购者之意在于向俄国社会介绍中国、介绍北京。但是在今天我们看来,这些民俗画全面系统地记录了晚清时期北京的社会生活和民风习俗,经过百馀年的岁月磨蚀,这些内容大多数已成为难以寻觅的历史陈迹。因而,这些外销民俗画难得地再现了北京的生活文化,折射着北京市民或农民群体上的文化心理和民族思维特征,成为研究晚清北京城市和社会文化的重要的历史资料。中国民俗学者和苏联汉学家对之早有关注。中国的民俗学研究者认为,这些民俗画“忠实地反映了晚清时代北京民俗生活的现实”,从中“得见历史进化之真实缩影”^①。在中国当代学者关注的北京民间风俗中,与波波夫画册内容相近者甚多,与第一册相近者八:4幅手工业图(收拾锡器、蘸羊油烛、做潮烟、做席),4幅商贸图(卖仙鹤灯、卖江米人、卖琉璃喇叭、卖估衣);与第五册相近者十三:2幅生活民俗(乳母、摇车),3幅工商业民俗(箍桶、卖仙鹤灯、串铃卖药),3幅社会组织民俗(广东妇人、汉官太太、武场考试搬石),5幅游艺民俗(踢球、放风筝、撞钟、点蒿子灯、玩雨水泡)。1991年,香港艺术馆举办馆藏外销画展览时,也提到了其馆藏的北京外销民俗画,约有30幅。

1958年,前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在北京采购图书时,在旧书店中买到类似的画册,该画册共301幅,为北京外销画著名画家周培春的仿画,其中的不少内容与波波夫画册的内容接近。

国外学术界对清代中国外销画一直有所关注,1904年,在美国圣路易举行的世界博览会上,便展出了186幅此类图画,该画现藏于美国惠康图书馆(Wellcome Library)^②。2009年俄罗斯科学院汉学家协会主席、科学院院士米亚斯尼科夫主持了“关于中国清代历史的非传统史料丛书”,其中的《民俗画上的清代北京》(Цинский Пекин картины Народной жизни)^③一书,发表了波波夫画册的第一册和第五册。近年来,国内学术界也关注到这一内容,2011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八卷本的《大英图书馆特藏中国清代外销画精华》^④,其中的第七册和第八册便收入了176幅清代北京外销民俗画。

①刘凌沧:《北京民间风俗百图》,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

②Hartmut Walravens, Catalogue of Chinese Books and Manuscripts in the Library of The Wellcome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London: The Wellcome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1994.

③Цинский Пекин картины народной жизни, СПб., 2009.

④《大英图书馆特藏中国清代外销画精华》,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

4.丰富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内容。

俄藏老北京民俗画体现了中外文化交流历史上中国、俄国、欧洲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18-19世纪的英国画家钱纳利(George Chinnery,1774-1825)客居澳门作画卖画,成为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进入图画并远播欧洲的契机,在钱氏众多的中国学徒的笔下,中外交往的重要地点——中国广东的社会与生活一度成为外销画的主要内容。北京人周培春也曾为钱纳利的学徒,后又回到北京,开办画坊,向外国人售卖记录北京民众生活的画作,其后其子继承家业,周氏画坊得以持续发展。北京是历史上中俄交往的重要城市,自1715年起俄国向北京派出东正教使团,中俄两国签约规定其活动范围只限于北京。因此,俄罗斯人订购的中国民俗画以及周氏画坊画作的描绘对象是北京的市井民俗。周培春将钱纳利带来的绘画技法用于再现北京民众的日常生活场景,在周氏之后,随着北京外国人的增多和外部世界对中国兴趣的增加,接受外国人的订购出售这画民俗画的画坊相继出现,展现老北京市井生活的外销画的数量也随之增加。北京民俗进入外销画的过程,彰显着中外关系史上的中国、俄国、欧洲之间的微妙联系。

作者工作单位:柳若梅,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
波波娃,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